

朦胧诗 新编

洪子诚
程光炜
编选

北岛 芒克 多多 岳重 食指 黄翔 方含 齐云 田晓青 林莽 顾城 舒婷 杨炼 江河 王小妮 梁小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EXINGTON AVENUE
NEW YORK, NY 10017
TEL: 212 850 6645
WWW.CHICAGO.PRESS.C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朦胧诗 新编

洪子诚
程光炜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朦胧诗新编/洪子诚、程光炜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354-4178-2

I. 滕… II. ①洪…②程… III. 朦胧诗—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8645 号

责任编辑:沉 河

责任校对:刘惠玲

封面设计:徐慧芳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23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500 行 印数:1—6000 册

定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序

洪子诚

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和朦胧诗运动，距今已经二十余年。在“文革”结束后的历史转折时代，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它所表现的激情与表达方式，为后来的新诗写作者开启了富有成效的创造空间。今天，重新编选这些作品，不仅出于诗歌史研究上的考虑，也是为着对朦胧诗的那些并未失去的价值的重新确认。



《今天》的创办

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当代诗歌的创新活力，主要来自“复出诗人”的创作，特别是来自“崛起”的，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新诗潮”。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革”期间，一些地方存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歌”的“潜流”。“文革”结束之后，社会政治、诗歌文化环境出现重要变化。在目标上，带有与“当代”前三十年的诗歌主流“断裂”的诗歌思潮开始涌动，并在当时呈现“反叛”的姿态。这种“断裂”，既是诗歌“内容”（取材，表达的观念、情绪）上的，也表现在艺术方法方面。它们由于表现了某种“异质”倾向，而不能为当时的“主流诗界”普遍认可。不过，在主要是城市知识青年和大学生的阅读群体中，已迅速蔓延，并产生强烈反响。大多数作品难以在由国家控制的报刊上登载，因而，最初采用“非正式”的发表方式。“文革”期间延续下来的传抄仍是主要手段，而自办诗报、诗刊、自印诗集，也开始成为重要方式。许多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学，出现了同人性质的诗刊，并形成各种诗歌“小圈子”。最早创办并影响广泛，后来与朦胧诗有密切关联的自办刊物，是出现于北京的《今天》。



《今天》创刊于1978年12月23日，由北岛、芒克等主办^①。它刊登小说、诗、评论和少量外国文学译介文字^②。小说虽然占据不小的分量，但主要影响是诗歌。创刊号上署名“本刊编辑部”的《致读者》（代发刊词，由北岛执笔），表达了《今天》同仁当时的社会、诗歌理想。在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来批判“文革”期间实行的“文化专制”之后，表达了一种人们普遍存在的“创世纪”激情，……“四五”运动^③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一时代必将确立每个人生存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将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深刻的本质来。

《致读者》之后的宣告是：“今天，当人们重新抬起眼睛的时候，不再仅仅用一种纵的眼光停留在几千年的文化遗产上，而开始用一种横的眼光来环视周围的地平线了。……我们的今天，植根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植根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中。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今天，只有今天！”

《今天》共出版九期。它刊载了食指、芒克、北岛、方含、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严力等的写于“文革”期间或写于当时的作品。如舒婷的《致橡树》、《中秋夜》、《四月的黄昏》、《呵，母亲》，北岛的《回答》、《冷酷的希望》、《太阳城札记》、《一切》、《走吧》、《陌生的海滩》、《宣告》、《结局或开始》、《迷途》，芒克的《天空》、《十月的献诗》、《心事》、《路上的月亮》、《秋

① 据《鄂复明访谈录》称，《今天》“创办人”为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孙俊世、张鹏志、陶家楷、马德升：“他们把架子搭起来了。”（《沉沦的圣殿》第149页）另一种说法是，“第一届编委：芒克、北岛、黄锐、刘禹、张鹏志、孙俊世、陆焕兴。《今天》第1期后，因文学及社会见解，编辑部发生分裂，五人退出。遂由芒克、北岛重新牵头成立第二届编委，有北岛（主编）、芒克（副主编）、周郢英、鄂复明、徐晓、陈迈平（万之）、刘念春。后黄锐复来，……赵一凡为幕后编委。”（《沉沦的圣殿》第312页）另外，有多人指出（包括后来在国外出版的《今天》编辑部），赵一凡是《今天》的“创始人之一”。

② 如刊登万之的多篇短篇小说，北岛的中篇《波动》、短篇《在废墟上》、《稿子上的月亮》、《归来的陌生人》（均署石默）、《旋律》（署艾珊），刊登格林（英）、叶甫图申科（苏）、小库尔特·冯尼格特（美）等的短篇小说，多篇评论文字，以及摄影和艺术作品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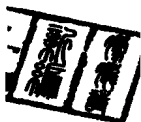
③ 发生于1976年4月间的天安门事件，在“文革”后一段时间，被许多人称作与“五四运动”同样具有伟大意义的“四五运动”。

天》、《致渔家兄弟》，食指的《相信未来》、《命运》、《疯狗》、《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愤怒》，江河的《祖国啊，祖国》、《没有写完的诗》、《星星变奏曲》，顾城的《简历》，杨炼的《乌篷船》，方含的《谣曲》等。其中，不少后来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作”。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①。其间，还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活动^②，并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被要求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很快也停止了活动^③。由于《今天》在这段时间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作是朦胧诗的核心，甚至被看作就是朦胧诗。

朦胧诗命名与论争

在79—80年间，《今天》诗人的作品（不限于刊发在《今天》上的）广泛流传，已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事实。一些“正式”出版的文学刊物，也开始慎重地选发他们的诗作，影响因而进一步扩大。1979年3月，《诗刊》登载了发表于《今天》创刊号上的北岛的《回答》；继之，舒婷同样刊于《今天》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诗也为《诗刊》所采用。这一年10月复刊的《星星》（成都），将顾城的《抒情诗19首》放置在头条的显著位置。《诗刊》在1980年第4期又以“新人新作小辑”的专栏，发表包括“新诗潮”诗人在内的一组作品。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的刊物，如《星星》（成都）、《上海文学》、《萌芽》（上海）、《青春》（南京）、《丑小鸭》（南京）、《芒种》（郑州）、《春风》（沈阳）、《长江文艺》（武汉）、《四川文学》（成都）等，也都陆续发表后来被称为朦胧诗诗人的一些作品。

对以《今天》为代表的“新诗潮”的评价，很快成为诗界的中心话题，并形成对立的意见。公开在“正式”出版物上披露自己观点的，是“复出”



① 芒克诗集《心事》，北岛诗集《陌生的海滩》，江河诗集《从这里开始》，艾珊中篇小说《波动》。

② 1979年4月8日和10月21日，均于北京玉渊潭公园八一湖畔的小松林举行。

③ 1980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根据政务院1951年的法令“刊物未经注册，不得出版”，要求《今天》杂志停刊。后申请注册复刊，不被允许，12月再次通知《今天》停止一切活动。



诗人公刘的《新的课题》^①一文。对于顾城等青年诗人看待历史的“片面”，和情绪的“悲观”，他由衷地感到忧虑；主张给这些敏感的“迷途者”以“引导”，“避免他们走上危险的道路”^②。不过，这些诗人的大多数并不认同被“引导”的位置。1980年4月在南宁召开的“全国诗歌讨论会”，提供了对立观点激烈争论的场所。有趣的是，不论是认为新诗将出现繁荣前景，还是认为已陷入难以摆脱的危机，都把很大一部分原因归结为这类诗歌的出现。

南宁会议后不久，诗评家谢冕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③，对“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一批新诗人”予以支持。他的论断，主要来自于他对诗歌要“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活”的要求（其实，这同样也是“新诗潮”反对者立论的基点）。谢冕以“历史见证人”的姿态，以理想的“五四”开放的文学精神作为标尺，对诗界提出这样的规劝：“对于这些‘古怪’^④的诗，有些评论者则沉不住气，便要急着出来‘引导’。有的则惶惶不安，以为诗歌出了乱子了。……但我却主张听听、看看、想想，不要急于‘采取行动’。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涉的教训（而每次粗暴干涉都有着堂而皇之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这一立场，为一些人所赞同，也受到许多人的批评。后来，支持新诗潮的批评家孙绍振、徐敬亚，还撰写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和《崛起

① 文章的副标题是《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星星》1979年复刊号，10月出版。《文艺报》1980年第一期转载。

② 《文艺报》转载公刘文章所加的《编者按》也认为，“他们肯于思考，勇于探索，但他们的某些思想、观点，又是我们所不能同意，或者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幼苗中间长出参天大树来。”

③ 为谢冕在“全国诗歌讨论会”上的发言，经整理后刊发于《光明日报》（北京）1980年5月7日，和《诗探索》（北京）198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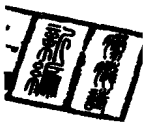
④ 诗评家丁力等在私下把这些有争议的诗称为“反现实主义”的，“脱离现实，脱离生活，脱离时代，脱离人民”的“古怪诗”。这一观点，在他后来的文章《新诗的发展和古怪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2期）、《古怪诗论质疑》（《诗刊》1980年第12期）公开表达。

的诗群》^①的文章。他们的观点后来被称为“‘崛起’论”，这三篇文章则被称为“三崛起”。

到了1980年下半年，这些备受争议的诗“无意”中获得同样备受争议的命名：“朦胧诗”。1980年第8期《诗刊》刊载了《令人气闷的“朦胧”》（章明）的文章，对那些“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的作品，称为“朦胧体”。文中引述的诗例虽不是《今天》诗人的作品^②，但谈及的现象，和后来有关诗歌朦胧、晦涩的争论的举证，则主要来自于“新诗潮”探索者的作品。因为争论的最初阶段，主要围绕艺术革新与阅读习惯、鉴赏心理之间的矛盾展开，“朦胧诗”的名称遂被广泛使用。

1980年，诗歌争论的另一热点发生在福建。《福建文学》（福州）开辟了以舒婷创作为主要讨论对象的“新诗创作问题”专栏，时间持续一年多。编者的按语说，“舒婷的创作，不是偶然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当前诗坛上一股新的诗歌潮流的代表之一。如何分析这股新诗潮，是目前诗歌界普遍关注和思考的中心，也是我们这场讨论争议的焦点。”^③讨论后来从对这一“新的诗歌潮流”的分析，扩展到对中国新诗60年的经验和问题的争辩。

对于朦胧诗，一些老诗人给以积极支持。但另一些有威望的前辈则持激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一股逆流”^④；朦胧诗的“理论的核心”，“是以‘我’作为创作的中心，每个人手拿一面镜子自己照自己”，“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⑤。诗界的这些权威者最担心的倒不是朦胧诗本身，“朦胧诗作为一



① 分别刊登于《诗刊》1981年第3期和《当代文艺思潮》（兰州）1983年的第1期。

② 章明文章中的举例，一是“九叶诗人”杜运燮的《秋》，另一是青年诗人李小雨的《海南情思·夜》。

③ 《福建文学》1980年第2期。

④ 《关于朦胧诗》，《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1期。在1982年《诗刊》等召开的多次会议上，臧克家总是“语调急促，词锋锐利”地批评“朦胧诗”等的“诗歌领域内刮起的一股黑风”。82—83年间，激烈批评“朦胧诗”和“崛起”论的，还有柯岩、朱子奇、周良沛等。参见唐晓渡《我所亲历的80年代（诗刊）》，“诗生活”网站：“诗生活文库”。

⑤ 艾青《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上海）1981年5月12日。



种文学现象,不足为奇”。他们最不满的是那些“吹捧朦胧诗,把朦胧诗说成诗歌的发展方向”的批评家。有关朦胧诗评价的争论持续几年时间。支持者认为,这些诗摒弃空洞、虚假的调头和陈腐的套式,探索新的题材,新的表现方法,是“对权威和传统的神圣性”挑战的艺术革新潮流,推动了当代诗歌“多元并立”的艺术创新局面的出现。批评者则指责其思想艺术倾向,是“反现实主义”的,是摭拾西方现代派的余唾,背离了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对朦胧诗及“‘崛起’论”的批判,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达到“高潮”^①。但时变境迁,这种依靠政治权利施加的压力已难以顺利奏效。为愤激情绪所控制的挞伐者在当时也未能看清情势:朦胧诗事实上已确立其稳固地位;作为一个“诗歌运动”,它也已处在“退潮”的阶段。

《今天》以及朦胧诗,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流派。但这些诗人在诗歌精神和探索的主导意向上具有共同点。其时代意义和诗学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精神向度与诗歌写作上,“个体”精神价值的提出与强调,是最值得重视的一点。朦胧诗在开启新诗那些被长久封闭的空间上,在激发诗歌探索的激情与活力上,在推动当代诗歌艺术视野的拓展,寻找与人类广泛文化积累的对话,以及发掘现代汉语的诗歌可能性等方面,都有难以忽视的功绩。至于说到“朦胧”,也应该是诗歌语言变革的重要一项。至少在“当代”中国,“朦胧”并不能从“纯”技术的层面理解,或单纯看成风格问题。朦胧诗与当时“环境”构成的紧张冲突,根源于它的语言的“异质性”,它表现的某种程度的“语言的反叛”:“拒绝所谓的透明度,就是拒绝与单一的符号系统……合作”^②。因而,“朦胧诗”这一称谓虽受到不少质疑,却不一定就是十分离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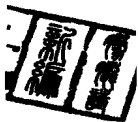
秩序建构与“地下诗歌”发掘

^① 批判朦胧诗及“‘崛起’论”,是1983年10月召开的“重庆诗歌讨论会”的主题。会上集中批判了“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严重的挑战”的“‘崛起’论”,也对“近年出现”的“颠倒美丑、混淆新旧、空虚绝望、阴暗晦涩”的一类“有严重错误”的诗,如《诸日朗》(杨炼)、《墙》(舒婷)、《彗星》(北岛)、《流水线》(舒婷)、《空隙》(顾城)等,“进行了批评”。参见吕进《重庆诗歌讨论会》,《文艺报》(北京)1983年第12期。

^② 刘禾《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第XVI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朦胧诗在传播、论争中确立其地位,也同时建构自身的“秩序”。这涉及到朦胧诗的定义,“代表性”成员和作品的认定,朦胧诗的“起源”与流变,朦胧诗与文革中的“地下诗歌”的关系等^①。影响、制约建构的主要因素有:论争中某一作品引例的“频率”;重要批评家和当事人的观点;作品“性质”(思想与艺术方法)与当时社会、诗歌主潮的切合程度;作品发表的时间和发表方式;诗人与当时诗歌运动的关系;诗歌选本的编选、流通情况等等。

在朦胧诗论争期间,诗歌界对朦胧诗的特征、指称的对象等,认识大体相近。但也存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在新诗潮内部。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诗人、哪些作品可以划入“朦胧诗”,哪些诗人可被看作是朦胧诗的“代表”?从80年代前期一些诗歌选本和批评文章中可以看到,这方面的“认定”是同中有异^②。对个别诗人应否进入朦胧诗行列的分歧可能不是看得那么紧要,但对另一些诗人在朦胧诗中的位置,特别是牵涉到所谓的“核心”、“代表”诗人的认定,事情就会变成含糊不得。80年代中期一度出现的那种“五人”(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格局^③,显然不能被普遍接受^④。



① 赵焱的《80年代诗歌“场域自主性”重建》一文对此有深入讨论。该文收入《激情与责任》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另见《今天》2002年秋季号(总58期),今天文学杂志社2002。

② 可以注意的一些现象是:在《今天》上发表诗歌作品的有些作者,在朦胧诗论争中并没有被较多提及,如食指、芒克、方含、严力等。1982年辽宁大学中文系编印的《朦胧诗选》(油印本),收入舒婷、芒克、北岛、顾城、江河、杨炼、梁小斌、王小妮、吕贵品、徐敬亚、杜运燮、傅天琳12人。徐敬亚《崛起的诗群》(1983)一文中列举的诗人名单,比起《朦胧诗选》(油印本)来,删去了芒克、徐敬亚、吕贵品、杜运燮,增加了孙武军。1985年《朦胧诗选》(阎月君编,修订本,春风文艺出版社)比起油印本,删去杜运燮,加入孙武军。徐敬亚等编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中,列为“朦胧诗派”的成员是:北岛、江河、芒克、多多、舒婷、杨炼、顾城、骆耕野、梁小斌、王家新、王小妮、徐敬亚12人。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多种当代文学史、诗歌史著作、教科书中,多数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作为最重要的评述对象。2002年《朦胧诗选》再版时,增加了食指和多多。

③ 198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收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5人的作品。这显然暗示他们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此后的一些文学史、诗歌史论著,采用了这一认定。

④ 多多在写于1988年的文章中讲到,“常常,我在烟摊上看到‘大英雄’牌香烟时,会有一种冲动:我所经历的一个时代的精英已被埋入历史,倒是一些孱弱者在今天飞上天空。因此我除了把那个时代叙述出来别无它法。”文章显然拒绝当时朦胧诗“核心诗人”的那种排列。该文刊于《开拓》1988年第3期,后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一书,篇名为《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收入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时,篇名改为《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



朦胧诗看法的分歧的另一方面,则是时间界限上的。朦胧诗是专指1978年以后几年中“出现”(在这段时间写作;或不写在这一时间,但在此时“发表”)的诗,还是包含更长的时间段落?具体地说,朦胧诗可否上溯至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而下限又可否延伸至朦胧诗人80年代中后期的创作?在这个问题上,开始人们更多承认比较严格的“朦胧诗”概念,待到朦胧诗的地位确定,声誉日隆之后,概念便朝边界不断拓展的趋势推进。朦胧诗概念的扩大,与80年代后期开始的“地下诗歌”发掘的工作,处于互动的关系中。

80年代初,大多数读者并不了解在“文革”期间,存在过后来所称的“地下诗歌”;虽然当时有一些诗作,发表时篇末注明是写于“文革”的某一年份。事实上,《今天》(尤其是最初几期)所登载的诗,不少据说是“文革”间的旧稿^①。这些诗,除作者本人提供外,许多由当时参加《今天》编辑的赵一凡^②提供。随着朦胧诗影响扩大,“朦胧诗”的“起源”问题,以及“文革”中与“朦胧诗”具有相似美学特征的诗歌现象,受到关注;相关的材料开始披露,某些事情被着重讲述。多多的写于“文革”和80年代初的诗发表:1985年初出版的《新诗潮诗集》^③收入他的30余首(组)作品。他是朦胧诗已成“历史”时才被确认的“朦胧诗人”。北京60年代初“诗歌沙龙”的情况也被发掘;它们被处理成后来“地下诗歌”的“根”^④。这指的“X小组”(郭世英、张鹤慈为主要成员,有的文章称“X诗社”)和“太阳纵

① 如芒克、北岛、食指、方含、齐云等刊发于《今天》的许多作品。

② 赵一凡(1935—1988),浙江义乌人,生于上海。自幼因伤致残,只上过三年小学,靠自修学完大学中文学科课程。为商务印书馆等担任辞书和古典文学书籍校对工作。他“最重要的贡献是进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资料的收存和整理”,在“文革”期间,因保存了被称为“地下文坛”的大批资料,在1975年1月,以“交换、收集、扩散反动文章”和参加并不存在的反革命组织“第四国际”的罪名,被捕入狱。1976年12月出狱。两年后获平反“恢复名誉”。1988年病逝。生平资料参见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第三章赵一凡专辑。《沉沦的圣殿》第129页称,“至少《今天》前4期或前5期的绝大部分稿件是赵一凡提供的。”

③ 《新诗潮诗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学生老木(吕林)主编,上下两册,署“内部交流”,为“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未名湖丛书”。收八十多位作者的诗作。其中多多有三十几首(组)作品。作为附录的“中国现代诗20首”,分属李金发、朱湘、戴望舒、卞之琳、穆旦、艾青、郑敏、废名、陈敬容、杭约赫、唐祈、纪弦、辛笛、袁可嘉、唐湜、郑愁予、洛夫、余光中、杜运燮、蔡其矫。这可以看作编辑者当时对“新诗潮”的“源流”的理解。

④ 《沉沦的圣殿》一书把“X诗社”等的活动,称为“时代之根”。第1—3页。

队”^①。也发掘了黄翔的早期写作(60年代初),提及贵州“启蒙社”的活动;但对黄翔、“启蒙社”是否与朦胧诗有关,人们存在不同看法^②。“地下诗歌”发掘的最醒目成果,首推食指和“白洋淀诗群”的发现。

关于“文革”间白洋淀的诗歌活动,80年代中期有的文章已有介绍^③。1988年多多的被经常征引的文章《被埋葬的中国诗人》^④,对发掘、整理食指与“白洋淀诗群”的历史,起到重要作用。朦胧诗运动期间,《今天》发表过食指的一些作品,《诗刊》也登载过他的《我的最后的北京》。但由于身体状况等方面原因,他的名字不为关注朦胧诗的读者更多了解。似乎要被“掩埋”的这种迹象,引起那些认为“食指是开辟一代诗风的先驱者”的人们的忧虑^⑤。出于“还原”历史“真相”的动机,从80年代后期开始到90年代,开始了重新“发现”这一“当年在一代青年中广为传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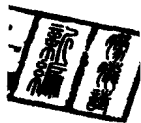
① 《X诗社与郭世英之死》(牟敦白)、《“太阳纵队”传说及其它》(张郎郎)。收入《沉沦的圣殿》一书。

② 贵州的黄翔、路茫、方家华、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启蒙社”,于1978年10月来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出总题为《启蒙:火神交响诗》的共一百多张的诗歌大字报。接着,12月到次年3月间又五次到北京。北岛1992年在伦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说,“……到了1978年的时候,突然政治气候转变了。我记得一个转变的最重要的迹象,就是1978年10月11号,在王府井大街贴出了黄翔和几个贵州青年人的诗。”“他们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转引自钟鸣《旁观者》第二卷第769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黄翔在给钟鸣的信(时间不详,大约90年代中期)中,抱怨他们的写作与活动,在有关朦胧诗的叙述中被忽略。“北京的一些人把中国当代诗歌的缘起总是尽可能回避南方,老扯到白洋淀和食指身上,其实是无论从时间的早晚、从民刊和社团活动、从国内外所产生的影响都风马牛不相关,食指的意识仍凝固在60年代末期,……他当时的影响仅局限在小圈子里,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见钟鸣《旁观者》第2卷。)

③ 贝岭《作为运动的中国新诗潮》,最初刊于在纽约出版的华文报纸《华侨日报》1986年12月25日。

④ 刊于《开拓》1988年第3期。这篇文章收入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一书时,篇名是《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收入刘禾主编的《持灯的使者》中,篇名为《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

⑤ 林莽《食指论》,《诗探索金库·食指卷》序,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黑大春在其诗论中,将“大诗人”食指的命运,概括为“过早的先驱,过迟的春天”,说“你犹如时代的抹布/擦去灰尘,又被弃于尘土”,见黑大春编《蔚蓝色天空的黄金·诗歌卷》第116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多多的《被埋葬的中国诗人》首先提到的就是食指(郭路生),称他从“早期抒情诗的纯净程度上来看,至今尚无他人能与之相比”。





的、传奇式的诗人”的活动^①。食指的当代新诗潮先驱者的地位,为不少人所认同。而“白洋淀诗群”的发掘和历史编纂也有计划进行。最见成效的是1994年5月以《诗探索》(北京)编辑部名义组织的“白洋淀诗歌群落寻访”的系列活动。曾经与白洋淀诗歌有关的原“知青”,集体“寻访”故地,举办讨论会,撰文讲述当年情景,披露“有研究价值的原始资料”,继续了多多等开始的对自身“历史”的建构,并为这一诗歌事实做出“白洋淀诗歌群落”的命名^②。在20世纪90年代余下的时间里,“地下诗歌”发掘和“新诗潮”重叙的重要成果,除食指和“白洋淀诗群”的“发现”外,还出版了作品集《中国知青诗抄》和《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在《今天》创刊20周年的时候,《持灯的使者》^③——一部集合当事人的回忆文字的“细节文学史”在香港出版。

以朦胧诗作为基点所进行的历史发掘、整理,存在着复杂、矛盾的态度。一方面,因着这种整理,朦胧诗不再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

① 1988年,漓江出版社(南宁)出版了他的诗集《相信未来》。1993年,他与黑大春的诗歌合集出版;北京作协分会的诗歌委员会举行了食指作品讨论会。同年出版的“当代诗歌潮流回顾丛书”(北京师大出版社)的《朦胧诗卷》中,选入食指的诗10首。1994年,《诗探索》(总第14期)开辟了“食指专栏”,刊发了食指创作谈,和林莽的《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的论文。在后来的几年里,北京多种报刊刊发了对食指的专访,和诗评家、他的朋友的评论、回忆文章多篇。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出版了《食指的诗》。

② 《诗探索》(总第16期)的“当代诗歌群落”专栏,集中刊登了他们回忆“文革”白洋淀诗歌活动的文章,作者有宋海泉、齐简、甘铁生、白青、严力等。专栏的“主持人的话”(林莽执笔),表述了他们在寻访讨论中形成的共识,以“这段诗歌活动的亲历者”的身份,提出对这一诗歌“群落”的叙述方式和“定位”的主张。这里的引文,均引自“主持人的话”。

③ 《中国知青诗抄》,郝海彦主编,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持灯的使者》,刘禾编,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中国知青诗抄》一书还刊有“续编”的“约稿启事”,要当年的知青“努力回忆、翻找旧作”,“一般不要修改”,并“注明创作日期”。这种构造“历史”的方法有其“可疑”的一面。

国当代的“现代诗”^①因此建立起了连贯的线索^②。这满足了我們有关历史进化有着清晰逻辑脉络的想象与期待，也加强了朦胧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不过，虽然“文革”“地下诗歌”的成立有赖于朦胧诗已确立的基座，但将食指、“白洋淀诗群”等看作是朦胧诗的“前史”，蕴涵着尚未成熟的“准备”的因素，又显然不为一些当事人与诗评家完全接受。因而，这种历史的“重建”，包括对朦胧诗认定的调整，还将会继续下去。

朦胧诗与“新生代”诗歌

在朦胧诗和“‘崛起’论”受到猛烈讨伐的1983年，《今天》作为“诗群”已不存在，“朦胧诗”的势头也已衰减。“衰减”的原因，部分在于朦胧诗影响扩大所带来的模仿和复制。而朦胧诗过早的“经典化”也造成对自身的损害。加上艺术创新者普遍存在的时间焦虑，加强了他们尽快翻过历史这一页的冲动。受惠于“朦胧诗”，而对中国新诗有更高期望的“更年轻的一代”认为，朦胧诗虽然开启了探索的前景，但远不是终结；他们需要反抗和超越。



此时，社会生活的“世俗化”的进程加速，公众高涨的政治情绪、意识已有所滑落，读者对诗的形象也发生变化。国家、政党要求诗承担政治动员、历史叙述的责任的压力，明显降低。“新诗潮”的大多数后续者大多出生于60年代，他们获得的体验，和朦胧诗所表达的政治伦理判断不尽相同；也不大可能热衷于朦胧诗那种雄辩、诘问、宣告的浪漫模式。

① 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现代诗”始终是一个涵义暧昧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分别具有“异质的”、“区别于传统的”、“现代主义的”等涵义。

② 90年代初以后出版的许多当代诗歌史、文学史论著，都串连起了当代“新诗潮”的发展线索。如将60年代初北京的“X小组”和“太阳纵队”，以及“文革”中的“白洋淀诗群”，看作《今天》的“前驱诗歌”；认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经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冯至等肇起到40年代末的‘九叶派’止，即告人为斩断”，直到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地下诗歌”，才得以赓续；《今天》的“‘组织基础’乃是70年代的‘白洋淀诗群’和与其关系密切的北岛、江河等人。从‘X小组’、‘太阳纵队’，到‘白洋淀诗群’、‘今天’，有一条现代诗连续文脉可循。而《今天》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成熟的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群体的出现”（陈超《精神肖像或潜对话》，《打开诗的漂流瓶》第284—285页）。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1993），王光明的《艰难的指向——“新诗潮”与20世纪中国现代诗》（1994）、《现代汉诗的百年流变》（2003），程光炜的《中国当代诗歌史》（2003）等，在对这一问题上有相近的处理。



而在80年代中期前后，“纯文学”、“纯诗”的想象，成为文学界创新力量的主要目标之一。这种想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带有“对抗”的政治性含义，也表达了文学（诗）因为“政治”长久过多缠绕而谋求“减压”的愿望。“回到”诗歌“自身”，“回到”语言，“回到”个体的“日常生活”与“生命意识”，成为新的关注点。

一种与朦胧诗有别的“新的诗歌”应运而生。较早的时候，如1982年钟鸣等在成都创办的诗歌“民刊”《次生林》上载的柏桦、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的诗作，已表现出与北岛、舒婷式的朦胧诗有很大不同的面貌。柏桦的《表达》（1981）所“表达”的，是一种离开政治反叛意识的凄迷、暧昧的感性。稍后，韩东、于坚的那种关注“日常生活”，使用“口语”，放逐副词、形容词的“旁观者”的冷静风格，产生很大反响。在诗歌观念、艺术形态上与朦胧诗有异的诗，到了80年代中期，已蔚为大观。此后，出现了“他们”、“非非”等诗歌社团，出现了1986年的“现代诗大展”。对于朦胧诗之后的这一诗歌潮流，有“第三代”、“新生代”、“后朦胧”等的称谓。“新生代”诗人所要区分的主要对象是朦胧诗，显示了先锋艺术强调“断裂”，强调差异的策略。不过，诚如有的批评家所言：“‘第三代诗’恰恰是在饱吸了北岛们的汁液后，渐渐羽毛丰满别具一格的。”^①只强调朦胧诗与“第三代诗”之间的断裂，在它们之间划出深沟，虽然有助于加强“第三代诗”的地位，却与事实不那么相合，也可能对自身的发展带来某种损害。

朦胧诗主要诗人

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文革”期间，食指的诗在北京、河北、山西等地文学青年中，有范围不小的流传^②。他的写作的贡献，主要是在个体经验发现的基础上，对当时诗歌语言系统的某种程度的背离。在诗体形式和抒情方法上，食指与当代“十七年”诗歌有更直接的联系。写于196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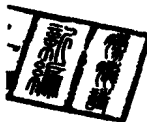
① 陈超《第三代诗的发生和发展》，《打开诗的漂流瓶》第25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② 《郭路生在杏花村》（戈小丽，收入《沉沦的圣殿》）中说，“文革”中，“郭路生的名声和诗歌很快传遍了方圆百里。附近公社及大队的北京知青纷纷来拜见诗人，和他谈诗，使我们杏花村快成了诗圣朝拜地了。”又说，“郭路生的诗很快如春雷一般轰隆隆地传遍了全国有知青插队的地方”。这种描述今天已很难做出判断。

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①，最为读者熟悉。后者记录了青年学生下乡“插队”，离开城市居住地时的情感和心理反应。诗中出现的有着深刻精神体验的“细节”，传达了对于疼痛、依恋，和因脚下土地飘移而惶恐的感觉。

北岛70年代初开始写诗；“文革”后期也写过《波动》、《幸福大街十三号》等中短篇小说^②。他被看作是《今天》（或朦胧诗）的“领袖”人物，在朦胧诗论争中也最受争议^③。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作品，主要表达一种怀疑、否定的精神；在理想世界的争取中，对虚幻的期许，对缺乏人性内容的苟且生活的拒绝。抗争者悲剧性的紧张的内心冲突，历史“转折”的意识，和类乎“反抗绝望”的精神态度，在诗中有动人的表现。常使用预言、宣告和判断的语言方式。价值取向差异或对立的象征性意象密集并置所产生的对比、撞击，在诗中形成了“悖谬性情境”，是这个时期北岛最重要的诗艺特征。

1969年初，16岁的芒克和多多“同乘一辆马车来到白洋淀”，在这里一直居住到1976年初。虽是《今天》的创办者和“新诗潮”的积极参与者，但作品极少被“正式”刊物登载，也未曾出现于《诗刊》等组织的活动（如著名的1980年的“青春诗会”）。现存作品，最早的标明写于1971年。芒克白洋淀时期的诗，写有着耕种、成熟和收割的生活的温情和幻梦，写这一向往与“时代”发生的冲突，面对压力所做出的反应。虽然也喜欢赋予作品哲理、思索的色彩，突出之处却是诗中所呈现的“感性”。“自然的诗人”，“肉感的、野性的”，是他经常获得的评价^④。较少掩饰的“野性”的语言，对当时的生活伦理和诗歌想象规范肯定都是冒犯。不过，这种“冒



①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正式”刊登于《诗刊》1981年第1期时，题为《我的最后的北京》。

② 《波动》“文革”后刊于《今天》和在武汉出版的文学刊物《长江》，《幸福大街十三号》80年代初刊于《山西文学》。北岛在《今天》发表他写于“文革”时期的小说和诗时，有时使用艾珊的署名。这是为怀念1976年7月在湖北因下水救人而罹难的妹妹。北岛为此还写了《小木房的歌》等作品。

③ 他的作品受到反对朦胧诗者最严厉批评。如《一切》等被指责为“绝望主义者的嚎叫”。悲观、虚无主义是否定其诗作的主要理由。

④ 参见多多《被埋葬的中国诗人》（《开拓》1989年第2期），唐晓渡《芒克：一个人和他的诗》（《诗探索》1995年第3期）。